

外交学院 2008 年科学周 论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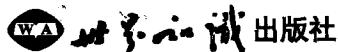


◎ 主 编 赵进军
◎ 副主编 高 飞



外交学院 2008 年科学周论文集

主编 赵进军
副主编 高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交学院2008年科学周论文集 / 赵进军主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11

ISBN 978-7-5012-3658-9

I .外… II .赵…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0834号

责任编辑 袁路明

文字编辑 傅立刚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陈可望

书 名 **外交学院2008年科学周论文集**
Waijiao Xueyuan 2008 Nian Kexuezhou Lunwen Ji

主 编 赵进军

副 主 编 高 飞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京晨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850×1168毫米 1/32 21印张

字 数 580千字

版次印次 2009年11月第一版 2009年11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3658-9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获外交学院李嘉诚学术基金资助

目 录

一、外交、国际关系

- 赵怀普 | 英国“三环外交”战略析论 / 1
周永生 | 麻生内阁对金融危机的对策 / 22
苑崇利 | 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思想根源 / 28
孙吉胜 | 国际关系中的语言研究与层次分析方法 / 39
卢 静 | 论对外开放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关系 / 57
魏 玲 | 认知共同体、跨国倡议网络与第二轨道进程 / 64
齐建华 | 对中国人权保护与发展中欧认同问题的分析 / 77
高尚涛 | “国家决策者的作用”模拟实验设计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决策模拟 / 85
陆晓红 | 试论《东盟宪章》不干涉原则的合理性 / 105
梅 琼 | 探析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宗教因素 / 123
崔海宁 | 中国参与东亚地区劳务合作的SWOT分析
及其战略选择 / 134
郭延军 | 浅析当代国际环境安全研究的不同范畴 / 147
李春怡 | 新中国建国后外交战略的演变
——《中国大战略与国际安全》书评 / 160
王振玲 | 解读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国内政策主张 / 168

- 雷建锋 | 欧洲议会在中欧关系作用与原因探析 / 177
赵 宏 | 对 20 世纪 50 年代中印关系的知觉性解释 / 190
李 敏 | 殖民化、改革及宗教因素对外交的影响
——以 19 世纪泰国为例 / 198
张 蕾 | 美国社会思潮中“反共主义”评析 / 209

二、政治、历史

- 余科杰 | 从温岭的改革发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温岭社会调查报告 / 221
李树军 | 感悟中央三代领导人对新疆稳定发展的关怀和指导 / 230
陈奉林 | 文化交流、文明交汇与历史发展
——读何芳川先生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 / 239
杨 帆 | 论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与经验 / 250
石 豪 | 平权措施
——种族与民族优惠政策的一个案例 / 263

三、经济、法律

- 刘曙光等 | 人民币国际化的约束条件分析 / 274
刘赛力 | 试析改革开放 30 年的成绩和问题 / 288
樊 蕙 | 东亚地区贸易合作的最新态势、原因与面临的挑战 / 303
竺彩华 |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税收因素研究 / 319
何 媛 |
崔绍忠 | 经济学的语境范式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超越 / 335
于丹翎 | 浅论 WTO 《有关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中善意原则在 WTO 争端解决机构中的适用 / 346

- 陈 阳 | 基于引力模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分析
——以中国对亚太地区 1998—2007 年 FDI 为例 / 357
- 万 霞 | 论外交职务与领事职务的竞合 / 370
- 张 华 | 承运人无单放货的责任分析 / 380
- 杨慧芳 | 外资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的要素 / 391
- 闵冬芳 | 论清代法律对故意杀人罪未成年受害人的特别保护 / 403
- 周加李 | 人治与法治是否可以结合?
——以新加坡模式为例 / 415

四、语言、文化

- 张 迅 | 从现象学、生存哲学看审美体验 / 428
- 张晓立 | 清教文化、消费文化与美国次贷危机 / 437
- 崔长青 | 为翻译学正名 / 451
- 郭立秋 | 语言·交际·翻译 / 461
- 童 新 | 舍伍德·安德森《俄亥俄的温斯堡》之浅析 / 471
- 徐 英 | 浅析解构主义与翻译 / 483
- 王 惠 | 从中国文化到华裔美国文化
——论当代华裔美国作家如何看待中国历史文化 / 490
- 龙 云 | 论传教士钱德明对中国音乐的接受 / 502
- 王晓侠 | 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评析萨特存在主义的
几个基本观点 / 516
- 梁春燕 | 词语附加义的社会文化内涵探讨 / 524
- 陈雪飞 | “面子”的跨文化探究 / 532

五、教学、管理

- 杨元元 | 富布赖特项目在美国文化外交中的作用 / 541
- 胡水娟等 | 外交外事特色英语听力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 550
- 张燕莉 | 教师期望效应理论及对教师的启示 / 561
- 从 林 | 《法国历史》课程教学以及使用多媒体技术的尝试 / 569
- 李金仙 | 采用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活动的学习效果
及影响因素分析 / 577
- 李雪娇 | 高等学校校院两级教务管理的思考
——以外交学院为例 / 589
- 匡道全 | 坚持并完善硕士招生全国统考制度初探 / 602
- 孙俊华 | 浅析高校科研激励机制的构建 / 611
- 尤 永 | 论高校图书馆基于读者兴趣的信息推送服务 618
- 钟红玮 | “学科馆员”制度及其对我院图书馆建设的启示 633
- 安小芃 |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640
- 胡 波 | 浅谈构建和谐校园中的高校图书馆建设 646
- 褚大勇 | 浅谈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 653



英国“三环外交”战略析论

赵怀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确立了“三环外交”战略，谋求继续保持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从内容和形式上看，英国与美国、英联邦及欧洲（大陆）关系这三个环节相辅相成、构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这有助于保持整个战略框架的稳定性。然而，其实际运作却表现为一个动态的调整过程，即上述三个环节在“三环外交”中的比重和重要性的调整与变化。本文主要探讨战后英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其基本假定是：基于欧洲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英国总是试图通过调整“三环外交”战略以争取尽可能多的主动。笔者以为，由于受二战后非殖民化浪潮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起英联邦因素在英国外交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故“三环外交”的调整更多地体现在英国对欧美政策的调整。大体而言，这种调整经历了一个从冷战时期的重美轻欧，经由布莱尔时期的欧美并重，再到后布莱尔时代重心可能偏向欧洲的演进历程，是为本文的总论点。

一、冷战时期的不对称平衡

英国是均势外交老手，且在近代以来的对欧关系中屡试不爽。丘吉尔曾坦言：“400年来英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反对欧洲大陆上最

强大、最具侵略性和最具支配性的大国……加入强大的一方并分享占领果实固然容易做到而且也极具诱惑性，但我们却总是知难而进，即加入力量相对较弱的国家一方以击败欧陆的暴君，不管他是谁。”^① 二战后，英国因为自身实力下降而丧失了奉行均势外交的条件，但均势思想却依然影响着英国的决策者。与以往不同的是，英国不再谋求欧陆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而是试图在欧洲建立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均势。鉴于苏联在欧洲的压倒性军事优势，英国从维护自身利益及西欧的安全出发，谋求将美国力量引入欧洲以形成对苏联的制衡。1947年初英国运用“转移负担”策略，敦促美国接管其在希腊和土耳其的防务责任，后来又积极组织西欧国家参加“马歇尔计划”和推动建立大西洋联盟，这些都是其为达到上述目标而采取的重要步骤。

在东西方冷战格局下，国家安全需求决定了美国在英国外交中的主导地位，而二战期间培育起来的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也促使英国更加重视对美外交。拜利斯认为，虽然英国声称不必在欧洲和美国之间作选择，但由于二战期间的惨痛经历，英国显然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做出了选择。^② 格罗塞指出，保持英美特殊关系、“通过影响美国来影响世界”被认为是英国外交的一项重要方针和谋略。^③ 英国希望通过大西洋联盟维护自身的安全，同时借助英美“特殊关系”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发挥调节作用。因此，英美关系就成为了“三环外交”中最基础、最重要的一环。至于其他两环，即与英联邦和欧洲的关系则基本上是辅助性的。一方面，战后非殖民化运动的兴起使得英国与英联邦的关系呈现日益松散和衰落的趋势，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英联邦环”在“三环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

① Stephen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8.

② John Bayli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to choose or not to choose?”, in John Baylis and Jon Roper,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Beyond the Neo-Conservative Divide?*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72.

③ 阿尔弗雷德·格罗塞：《战后欧美关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95页。

已经微不足道了。另一方面，英国对战后兴起的欧洲一体化运动能否搞成功也没有足够的信心，认为即使搞成了，但由于受冷战格局的制约，其自身的发展必定是有限度的，它必须从属于美国主导下的大西洋合作。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判断，英国在欧洲一体化启动后的较长一段时期里游离于欧共体之外。

然而，英国的困惑在于对欧洲一体化既不信任却又不能忽视。由于自身经济政治利益日益同欧陆国家联系在一起，英国显然不可能长期游离于欧共体之外，融入欧洲乃是势所必然。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两次不成功的申请后，英国于1973年最终加入了欧共体。由此，英国的欧共体成员身份不可避免地对其外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至少在战略上制约了其完全倒向美国的可能性。正如希尔所分析的，英国一直试图避免在紧跟美国和制衡美国两个极端中做出选择，其政策目标是为自己确立一个合适的位置，以便既能够对美国的政策施加影响，同时又不放弃在欧洲的好处。^①这一“合适的位置”被美其名曰“桥梁”作用，即英国凭借其在欧洲事务中的传统影响力以及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在欧美关系上发挥“桥梁”作用。1949年英国外交部的一份文件中就曾指出，作为欧洲的一个主要大国，英国在同美国打交道时将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而英国在欧洲的影响很可能既要靠自身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也要依赖其在美国所获得的影响力和支持。^②该文件清楚地表达了英国对欧美外交的目标，即在欧美之间周旋并谋求发挥主动作用，以此彰显其大国地位。这种“桥梁”作用被视为最符合英国安全政治及战略利益的一种平衡策略，它主导了战后英国对欧美的政策。华莱士和奥利弗指出，在过去的50年里，英国一直试图在目光狭隘的欧洲和经常忘

^① Christopher Hill, "Dilemmas of a Semi-Insider: Blairite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Christina V. Balis and Simon Serfaty, eds., *Vision of America and Europe: September 11, Iraq, and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The CSIS Press, 2004, p. 99.

^② Public Record Office, PRO: FO 371/76384, "Third World Power or Western Predominance", 23 March, 1949.

记欧洲人有着合法的不同利益的美国之间扮演“桥梁”角色。^①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外交战略的重心偏向英美关系，所谓的“平衡”注定是一种不对称的“平衡”，而这又决定了该策略操作的难度。其实，欧共体成员身份与英美“特殊关系”之间存在某种冲突性，这种冲突性在欧美关系和谐时或许不突出，但当出现矛盾甚至危机时则会凸显出来。冷战期间美欧基于共同的安全和战略利益较易实现合作，但由于地缘差异和利益分歧，双方仍难以在东西方问题上达到完全一致。因此，要想把握好对欧美外交的平衡谈何容易！

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奉行平衡策略的努力遭到了戴高乐的抵制。1961年麦克米伦政府申请加入欧共体，这一行动是同当时肯尼迪政府试图在北约框架内建立所谓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宏伟计划”相一致的。^②美国的倡议遭到了戴高乐的反对，后者对英美“特殊关系”也不以为然，担心英国加入欧共体后会成为美国的“特洛伊木马”。1962年底英美两国达成北极星导弹协议，这为戴高乐否决英国的申请提供了口实。1967年英国再次申请加入欧共体，并试图以更密切的技术合作为诱饵吸引法国，却又遭到戴高乐的反对。直到1973年在“亲欧派”首相希思的带领下，英国才最终加入了欧共体。加入欧共体标志着英国对欧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也意味着英国在处理对欧美关系时将更多地受到其欧共体成员身份的影响。加入欧共体后，英国同法国的合作有所加强，两国就开展防务合作以及可能的核合作等进行了广泛的双边讨论。此外，英国还参加了1970年成立的欧洲政治合作机制。尽管如此，希思政府也

^① William Wallace and Tim Oliver, "A Bridge too far: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in David M. Andrews, *The Atlantic Alliance under Stress: US-European Relations after Iraq*,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52.

^②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冷战趋缓和美欧经济权力关系的变化，大西洋联盟开始出现裂痕。法国总统戴高乐喊出“欧洲人的欧洲”口号，公开质疑美国在欧洲的霸权。作为应对措施，肯尼迪政府提出旨在保持美国霸权的“大西洋伙伴关系”计划，同时敦促英国加入欧共体。出于维护英美“特殊关系”以及英国在欧洲的长远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麦克米伦政府于1961年提出了加入欧共体的申请。

难以摆脱“平衡”外交的困惑。1973—1974年间发生了一系列对欧美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事件，包括尼克松政府的“欧洲年”计划、中东战争和欧共体发起的欧阿对话等。面对欧美特别是法美之间的对立，希思政府试图左右逢源，以维持对欧美外交的平衡。英国带头起草了1973年夏发表的“欧洲特性的声明”，以消除美国对欧洲政治合作目标的疑虑。与此同时，英国呼应法国的主张，参加了欧阿对话。1974年重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延续了保守党的平衡策略，它既想得到同欧陆进行外交政策磋商的好处，同时又倾向于保持英镑的全球联系特别是同美元的联系，而不是加入法国和西德发起的旨在稳定西欧货币的欧洲货币体系。^① 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后，英国外交的重心再次明显偏向美国。撒切尔夫人决心重新复兴英美“特殊关系”，而1980年英美达成“三叉戟”协议和1982年美国在马岛战争中支持英国被认为是英美“特殊关系”恢复的突出标志。撒切尔夫人做美国最忠实盟友的决心，同她与欧共体对抗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撒切尔政府先是围绕英国的摊款问题同欧共体进行抗争，后又坚决反对欧共体搞货币联盟，致使英欧关系降到了最低点。一些内阁要员对撒切尔夫人丧失在欧美间的平衡感到不满，纷纷挂冠而去，这最终导致了撒切尔夫人的辞职下台。梅杰继任首相后，试图恢复对欧美的平衡路线，但却受到党内“撒切尔派”的抵制和内阁中“欧洲怀疑派”的掣肘。结果导致梅杰不仅难以推行其欧洲政策，反而在一系列涉及欧洲建设的问题上采取了强硬立场。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梅杰政府的欧洲政策已经明显向右转，由“回到欧洲的核心”变为“在欧洲的核心里坚持自己的主张”。^② 梅杰政府在对美外交上也遭遇尴尬。老布什政府似乎更看重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的作用，也更加重视美德关系。1993年克林顿政府上台后，英美关系更趋于冷淡，原因之一是据传梅杰政府在

^① William Wallace and Tim Oliver, "A Bridge too far: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p.152.

^② 赵怀普：《英国与欧洲一体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页。

美国大选期间支持了共和党。

综上所述，对冷战时期英国的外交战略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一，美苏两极格局和东西方冷战构成了英国制定和奉行“三环外交”战略的基本国际背景，而安全需求和谋求在东西方关系中发挥“独特作用”的政治考虑决定了英美关系在“三环外交”中的支配性地位。二，由于难以忽视欧洲一体化带来的挑战，英美关系不可避免地同英国的对欧外交纠缠在一起，特别是英国的欧共体成员身份对英美关系构成了一定的制约。英国试图在欧美间维持一种平衡策略，谋求在欧美关系上发挥“桥梁”作用，借以抬高其国际地位。但知易行难，重美轻欧的战略偏好决定了所谓的“平衡”只能是一种不对称的平衡，而这无疑给该策略的操作制造了困难。三，尽管“平衡”策略屡屡受挫，但在冷战这一特定时期，英国的重美轻欧战略选择基本上还是成功的。由于欧洲的虚弱（尤其在军事上）和欧洲一体化的有限性，使得惯与强者为伍的英国自然把安全及维护大国地位的依靠放在了实力强大又与其有着“特殊关系”的美国身上。另一方面，美国出于联欧制苏的全球战略的需要，也比较看重军事实力较强且在北约中扮演关键角色的英国的作用。^①英国通过在一系列重大国际事务特别是涉及东西方关系的事务上与美国的密切合作，使得英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得到了基本维持和提高。不过，英国为获得这一利益却使其对欧关系受到了潜在伤害，而这将增加其日后调整对欧政策及协调欧美关系的难度。

二、布莱尔之难以驾驭的平衡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导致国际形势和欧洲安全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这使英国外交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苏联的解

^① John Bayli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to choose or not to choose?" p. 77.

体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呈现既竞争又合作的特点，这意味着英国失去了以往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扮演调节者的机会和条件。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则为欧洲一体化进程提供了新的动力，推进以欧盟建设为核心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成为欧洲国家的根本选择。欧盟的成立和发展淡化了英国在欧洲事务中的传统作用，使其对欧外交面临空前的挑战。此外，德国的统一以及随北约东扩而来的欧洲地缘战略重心的东移，使得英国的地缘优势下降，从而降低了对美国的战略价值。美国日益看重欧盟的作用，并越来越多的同欧盟以及德国打交道。一句话，冷战的终结对英国的影响是复杂的，既使其基本安全无虞，但同时也削弱了它发挥特殊作用的各种条件。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英国已经没有那么多的重要选择，对欧洲前途也没有宏伟的构想。它的相对衰落还降低了它在欧洲发挥传统的平衡作用的能力。”^①面对日益协调统一的欧洲、谋求“单极霸权”的美国和处于深刻变革的世界政治，英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势在必行。虽然梅杰政府曾做出过努力，包括试图使英国“处于欧洲的中心”，但终因受制于保守党内对欧政策的分歧而难以有所作为。这样，调整外交战略的任务就落到了1997年上台的布莱尔政府的肩上了。

布莱尔担任首相前没有什么外交经验，但他对国际关系却有着自己的理解。布莱尔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必须承担为国际社会谋福利的责任，因此要引导国家把利益追求同道德标准更精致地结合起来，在国际上积极捍卫国内所珍视的价值观。^②国家不仅要在对外行为上遵循“国际好公民”路线，在其主权领土范围内对本国公民的行为也要遵循同样路线，否则国际干涉就将是必要和必须的，此即布莱尔的所谓“新国际主义”国际关系哲学。必须指出，

^①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 42.

^② T. Blair, “Doctr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peech to the Economic Club of Chicago, Hilton Hotel, Chicago, Thursday, 22 April, 1999.

这一理念对不干涉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国际关系准则具有颠覆性影响，而布莱尔也正想借此为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制造一个标准化的理由。在他看来，这种干涉即使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也属合法，甚至连联合国的授权也不是必需的。1999年布莱尔在南非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宣称：“国际社会有责任采取行动……当国际社会一致认定某些目标却不能够就集体行动达成一致时，那些具有全球责任感的国家就必须采取行动。^① 简言之，布莱尔主张以“新国际主义”概念为基础建立新的国家行为规范，并将之付诸国际关系实践。

在“新国际主义”理念的驱动下，布莱尔把道德因素融入对外政策，试图籍此重构英国的国家身份和国际角色。布莱尔认为，对国家身份的认知决定国家利益，而英国的国家身份是由世俗道德和经济利益构成的。^② 布莱尔把英国看作是照亮世界人权和法制的“灯塔”，宣称要带领英国在国际政治中发起一场“道德十字军远征”(moral crusade)，从而为其在国际体系中谋得一个新位置。在布莱尔看来，英国虽不一定能谋得领导位置，但至少可以在欧美之间扮演“桥梁”角色，因为其“新国际主义”已合法地将英国置于迄今最重要的欧美联盟的中心位置。显然，布莱尔试图为英国外交打上道德主义的烙印。正如施莱姆30多年前就曾指出的，在任何新的国际秩序中都位于世界重要力量中心的认知以及自命的作为国际道德领袖的角色，取代了英帝国成为英国重新找回的大国作用的重要基础。^③ 布莱尔对冷战后英国国际作用的定位是“枢纽大国”，他说：“大约40多年前，迪安·艾奇逊说英国失去了帝国却没有找到新的角色。之后几代英国政治家苦苦寻找，却都没有成功。但现在英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是作为一个超级大国而是作为

^① T. Blair, "Facing the Modern Challenge: The Third Way in Britain and South Africa", speech at Cape Town, South Africa, January 8, 1999.

^② Maria Fanis, "New Labour's Foreign Policy after September 11: A Moral Crusade in a Multilateral Setting", in Matthew Evangelista and Vittorio Emanuele Parsi, eds., *Partners or Rivals?: European-American Relations after Iraq*, Milano: Vita e Pensiero, 2005, p. 97.

^③ A. Shlaim, "Britain's Quest for a World Rol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 1(1975):839.

一个枢纽国家，作为一个处于将影响世界及其未来的联盟和国际政治核心的大国。”^① 布莱尔进一步解释英国的“枢纽作用”，称这“意味着英国不必在欧美之间做出选择，事实上英国必须同时兼修欧美：因为我们在欧洲强大，所以同美国打交道时就更强大，因为我们同美国的关系强大，所以在欧洲就更加强大。”^② 他还公开宣称：“过去30年来，我们第一次有了这样一个政府，它既支持欧洲也支持美国。我坚信这是符合英国的利益的，它同时也符合美国和欧洲的利益。”^③ 布莱尔希望通过采取欧美并重的策略，以发挥英国在欧美关系上的“枢纽”和“桥梁”作用。他上台伊始就宣称其政府将致力于使英国“处于欧洲的中心”，同时也将努力保持英国同美国的“特殊关系”。^④

布莱尔政府外交战略调整的重点是对欧政策，目的是试图打破梅杰政府时期英国对欧外交的僵局。这种调整的动力首先源于工党对欧盟立场的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英国工党逐渐脱离其传统的反欧立场，转而对欧共体持更加开放的态度。^⑤ 1994年布莱尔担任工党领袖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工党内外政策的改造。布莱尔强调要重视欧洲，称他“不会允许本党在欧洲被孤立或者被落在后面。”^⑥ 工党1997年的竞选纲领中批评保守党使英国“处于旁观者的位置”，称新工党将使英国发挥“领导作用”。^⑦

执政初期，布莱尔政府在对欧外交上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包括签署了欧洲社会宪章和《阿姆斯特丹条约》。尤值一提的是布

① T. Blair, speech at the Lord's Mayor banquet, November 22, 1999.

② T. Blair, “Britain's Role in the EU and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 speech at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the Associated Press, London, 15 December, 1998.

③ William Wallace and Tim Oliver, “A Bridge too far: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p.164.

④ William Wallace and Tim Oliver, “A Bridge too far: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p.152.

⑤ Ibid., p.159.

⑥ Peter Riddell, *Hug Them Close: Blair, Clinton and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London: Politico's, 2003, p.75.

⑦ Labour Party Manifesto, *Because Britain Deserves Better*, May 1997.